

近代中国直面“道出于二”

沈 栖

“道出于二”一语出自王国维。这位清末著名学者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彰显出我国近代巨变的是传统之“道”在西方新兴之“道”的冲击下,退缩为竞存的一隅之“道”,两者的相峙、对抗、消长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

中国自秦代始,沿袭的就是“道统”,“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道统似是永恒的。汉代确立“独尊儒家”后平添了“道统”的精神支柱。满族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沿袭其“道”,清政府信守的依然是“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以“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观念。梁启超在19世纪末说:“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张之洞更是认为“各国”自庚子后,“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中世纪古老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第一步,朝野以不同视角和旨趣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指向不再是“向后看”,而是“向外看”。对西方的认知,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与之相相应的是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

回眸我国近代“道出于二”的历程,洋务派率先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之“道”——仅止于器

物层面,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学习西方之“道”相统一,这一时代内容无疑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就“中体西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定形式的主观动机而言,洋务派未必有心打破传统之“道”,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传统之“道”的趋向。维新派所展示的社会政治蓝图显然甚于洋务派,他们由“师夷技”走向“师夷智”,由“变器”走向“变法”,戊戌变法在“道出于二”的选择上,比洋务自强运动走得更远,康有为们向往的是从“大一统”变成“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维新派把旨在“变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自是喋喋不休地讲“西艺”“西政”,但当西方之“道”溢出其心中设定的界线时便又露出了卫道士面目,“绝无干犯皇室尊严之心”,一语道破其以立宪挽救清朝危亡之初衷。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戊戌变法既否定又发展,不懈地以西方之“道”挑战清政府顽固秉持的传统之“道”,力图从根本上变革其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辛亥鼎革后成立亚洲首创的共和制以取代帝制,彻底动摇了“道出于一”的根基。由此引发的变局,诚如学者杜亚泉当年所说:不止是“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更是“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虽说清政府每每显示出“守道”的自信和“攘夷”的冲动,但直面西

方之“道”,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屡战屡败的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实际上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中西之“道”这两种秩序或体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为“浑融中外之迹”(光绪谕旨)——融入那个“世界”,不能不对自身之“道”进行大幅度修改,这意味着清政府无奈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20世纪伊始,晚清最后10年旨于“变法自强”的新政鲜明地打上了西方之“道”的印记,官制、教育、军事、法律诸多领域的改革以及奖励实业的举措明显地带有清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虽说清政府以“舍此更无他策”表示其立意“变法”的决心,但诚如清政府在濒临灭亡之际颁布的《实行宪政谕》所言:“促进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导致或隐或现带有西方之“道”意涵的新政最终在近代中国夭折。

很显然,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威逼利诱,其“道出于一”日渐淡化而徘徊、挣扎于“道出于二”层面,中西向新旧转换,传统的“道”式微,(直至以“打倒孔家店”开启中国现代社会的大门),而西方之“道”盛行。20世纪的几次政权递嬗,几不曾影响这一基本的格局和走向,所变的只是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以此探索着日臻梁启超当年所向往的“世界之中国”愿景的路径。



美颜功能

姬大利

“光宗耀祖”的魔咒

孙建兴

一位贾姓友人,时常会聊出一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话听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知道他是想借《红楼梦》的诗,去沾点“贾氏”的贵气。

封建社会消亡了,但亡的是制度,封建思想仍然存在着,尤其是氏族中攀祖附贵的习俗,一贯是中国社会极为热衷的追崇。

就拿《红楼梦》来说,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乘的就是祖上荣光:贾氏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史氏的“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王氏的“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薛氏的“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唯物主义与封建思想格格不入,可世俗上似乎也不情愿把这种习俗,从倡导的新思想中剥离出去,认为“祖上荣光”也是应当承袭的遗产,以至民间的祠堂祖庙,几经浩劫尚能完好地保留下来。

但凡有祠庙的,祖上大抵非绅即贵、抑或历史上留下过浓重墨彩的——这是氏族的荣耀!即便家道破落,后人也会固守着这块宗牌。

“攀祖附贵”成了追崇,没有显赫族史的人,往往就会以姓觅贵,哪怕没有血统,只要姓氏对得上,也会不乱章法地炫耀一番。这不奇怪,五百年前是一家嘛!尽管看似简单,可真要认祖归宗就难了,历史学家都头疼过:刘邦、朱元璋的祖上是谁呢?史册上,只有他们的后人,却考证不出他们的祖先。他们是“草根皇帝”,籍籍无名的祖宗就算再本分,也是传不过几代的。

元朝人石君宝,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为人者,或为显祖的后人、或为后人的显祖!他鲜明地抛出一个令国人700余年都摆脱不掉的魔咒——光宗耀祖!

人活一世,草本一秋。“光宗耀祖”作为一种氏族情怀,虽说格局狭隘但也算积极。做显祖谈何容易啊,更多人无非想出人头地,以飨后人的缅怀罢了。但“出人头地”就要去搏取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就要具备能满足氏族欲望的资本。

《无常经》道:常求诸欲境,不行于善事。“光宗耀祖”之所以被称作魔咒,源于氏族情怀打开的是邪恶的欲境之门。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蝇附骥尾而致千里”,欲念的狭隘性与私利性,使氏族成了不劳而获的享乐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蜕变成以“光宗耀祖”为己任。

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在魔咒下变成了魔鬼,一首绝命诗,道出了“光宗耀祖”的劫数:“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时代就像一部影像机,循环播放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镜头:“父贵子荣”、“夫贵妻荣”、“子贵祖荣”。在当下社会,有多少人还在魔咒之下演绎着和珅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禁不如吓

陈 仓

某开放式公园建成一大池塘,池塘环境优美,条件优越,池水清冽,一些游泳爱好者陆续前来游泳。为避免发生意外事故,避免被问责,避免招惹冤枉官司,公园管理处每天派专人阻拦,但收效甚微。

为了免责,公园管理处在池塘边树立禁止游泳警示牌:池水较深,严禁游泳,风险责任自负。不料,禁而不止,适得其反,远近游泳爱好者、钓鱼爱好者,以及想免费洗澡、免费洗衣者蜂拥而至,导致公园管理秩序日益混乱,池水日益肮脏。为此,公园管理处加立禁止牌:严

禁钓鱼! 严禁洗澡! 严禁洗衣!

四个严禁的警示牌没有起到禁止作用,反而产生逆反提示作用,公园管理处毫无办法,只好听之任之。一日,市环保监测站检测水质,检测结论:严重污染,水体有毒。

看罢水质检测报告,公园管理处主任立即指示工作人员采取措施,更换警示牌,牌子上只刷四个大字:水体有毒!

四个禁止,不如一个恐吓。游人看到“水体有毒”四个大字,立即退避绕行。

从此,池塘周边慢慢冷清寂静起来。



见缝插针

仲 海